

朋辈互助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基于一个超大城市的参与式案例分析

匡亚林, 吴佳馨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老龄化与数字化成为当今中国的两大特点,老年群体如何适应并融入数字社会是积极老龄化的重点之一。现实表明,当政策落地与技术创新的长时性与复杂性需要充分条件增效,且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滞后甚至消失时,朋辈效应的发挥将成为无法忽视的数字支持,其本身的主动性、普遍性和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地促进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关注老年群体受朋辈效应驱动,在数字融入进程中完成数字角色的重构与迭代,个体在环境、工具和人际的多重作用下完成数字融入的蜕变过程。为全面挖掘朋辈效应推动数字融入的潜力,构建“动机触发-互助路径-作用机制”综合分析框架以观察和理解老年群体在融入过程中的行为模式,通过参与式案例观测厘清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三重互构路径“动机嵌入-场景整合-行动扩散”,并进一步深入揭示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进程中以朋辈互助为核心,由具有融入共识和合作行动的多元互动关系凝聚而成,三维一体的“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的互构支持型的融入持续循环机制,揭示“数字贫困者”数字脱贫的行为逻辑,深入挖掘动态演化的形成机理,由此从现实维度切入提供不同层面的建议对策,以期从新角度解答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社会;积极老龄化;老年群体;数字融入;朋辈互助;数字贫困

中图分类号:D63;D6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4)03-0025-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老龄化与数字化成为当今中国的两大特点,老年群体如何适应并融入数字时代一直受学界和社会关注。智能、敏捷的数字时代实现了社会网络化和治理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驱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除了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科技发展可能会重创老年身份的话语建构,“老龄化”被构建为“衰老的身体、迟钝的大脑”,部分老年人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形成

了老年群体数字身份隐喻、社会支持缺位、科技排斥老等新的社会问题。费孝通曾指出:从愿望上讲,科技发展本身的建设性作用,应该包括促进完成个人在社会里的参与。所谓个人在社会里的参与,就是充分地承认每个人之间的相依性和互相的责任,把个人动作的配合体系贯通于集体活动的配合体系当中^[1]。因此从实践上看,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的参与,除了破除技术使用上的难题,还需在生理、心理层面跨越隔阂,而这不仅依赖于个人期望与努力的作用,更

引用本文: 匡亚林, 吴佳馨. 朋辈互助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一个超大城市的参与式案例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6(3): 25-3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SH090)

作者简介: 匡亚林(1986—),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研究。E-mail: kuangyalin@uestc.edu.cn

离不开数字空间所营造的情境、提供的道具及其他社会角色的相互作用。当前,为跨越老年数字鸿沟、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顶层设计、技术适应和代际支持都积极协同介入,但政策落地与技术创新的长时性与复杂性需要充分条件增效,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亦会滞后甚至消失,现实常见的老年社会交往表明朋辈效应的发挥成了无法忽视的数字支持,其本身的主动性、普遍性和可持续性能够有效促进数字融入。如何通过朋辈互助实现数字脱贫?或者说,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朋辈效应?对此,本研究尝试回答老年群体融入的效应发挥机制及关键驱动因素等问题,并提供经验借鉴,阐明老年群体成功融入数字社会的路径。

一、分析框架的构建

1.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及数字融入的相关研究

回溯既往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学术界主要从以下路径加以展开:第一条进路为老年群体数字社会分层研究,主要从数字贫困的普遍性和边缘化程度层面解读老年群体在数字资源获取、使用及效益方面呈现出的差异与不平等。早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就已频繁应用于描述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社会分层现象,部分学者将“信息穷人”定义为在数字鸿沟中的落后者^[2],提出可从边界、内容和动力三要素进行测度^[3]。美国学者Prensky根据年代将社会人口划分成两类:“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4],而后另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数字难民”的概念,用于描述主观逃离或者客观上被排除在数字社会之外的老年人^[5]。由于存在技术培养缺乏、智能终端获取困难、生理缺陷等障碍,我国的“40后”“50后”往往被称为“数字难民”^[6],也有学者称其为“数字贫困者”或“数字弱势群体”^[7]。闫慧将数字化时代的社群成员划分为数字精英、数字富裕、数字中产、数字贫困和数字赤贫五阶,老年社群是处于数字贫困的典型阶层^[8]。第二条进路为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的表现及影响因素。如,阿尔文·托夫勒提出“数字鸿沟”以形容信息差距^[9],数字融入一般指弥合数字鸿

沟的行动和过程^[10],而融入障碍和困境是数字鸿沟的外在表现。对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主要围绕着三级或延伸的多级数字鸿沟即接入沟、使用沟、认知沟^[11]或动机沟^[12]、权利沟^[13]等维度讨论表现及成因,具体表现为上网基础设施和终端条件不足、智能设备的使用无能、信息素养缺乏、数字归属感隔离导致的数字排斥,有学者进一步基于制度、文化、社会和本体排斥厘清数字排斥的影响机制^[14],也有学者运用SOR模型^[15]、创新扩散理论等理论工具细化讨论老年群体的消极技术使用行为和融入影响因素。第三条进路是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路径。其一,从个体赋能视角解读,随着技术局限感知的深化和数字鸿沟的进一步研究,聚焦于老年人个体态度转变、技能习得和素养增长,TAM模型^[16]、UTAUT模型^[17]等基础理论广泛运用于老年群体技术接受研究。其二,从社会支持视角解读,有学者主张推进数字融入界面系统适老化设计,搭建数字融入社会帮扶可行信息能力机制^[18];有学者从代际反哺^[19]、家庭支持^[20]勾勒家庭场域的助力,亦有学者由“精神接入”的困境与消解层面切入代际联系对年长世代数字融入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有研究指出数字反哺的效果有限,老年朋辈支持则更为日常^[21],提议构建社区老年数字融入互助小组模式^[22]。其三,从顶层设计视角解读,如林宝提出要建立多层次的老年人收入保障机制,提高老年人数字设备拥有率,满足其数字接入基本条件^[23],并以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目标为主要抓手,搭建配套政策体系。

通过分析已有文献发现:首先,既有研究同质性较强,国内外数字鸿沟的研究均难以逾越托夫勒的数字三段论(接入沟、使用沟与知识沟)研究,无法满足现行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需求,特别是当下的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问题亟须探索更适合中国话语体系的各种使用场域和情境下的数字融入策略。其次,研究多聚焦于家庭场域,关注基于代际支持的数字反哺,鲜少重视家庭场域以外其他角色身份的作用。最后,现有研究多基于逻辑思辨或量化研究等方法切入,侧重于政策建构或运用系统化数据验证数字鸿沟并以此提出相应对策,尽管目前

研究普遍意识到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具有多样性,但尚缺乏成功数字化的相关案例研究,忽略了典型案例的衍射性。较量化研究和思辨研究,案例研究可以捕捉到更细致颗粒度的解释空间,弥补粗线条或一味追求数据解释研究进路的不足,能够有效回应探索性研究问题并由此挖掘相似的行为逻辑,呈现出事实中的关键要素。为此,本研究使用案例研究法,聚焦城市研究场域中以朋辈互助为核心方式的数字脱贫过程,以期从新角度解答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问题。

2. 朋辈互助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分析框架

朋辈指朋友与同辈,1998 年 Martin 对朋辈社群定义为个体成员被社群吸引,并对社群产生浓厚的兴致和归属感^[24],彼此有意识互助能够促进团队向积极方向发展,其同样是数字融

入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朋辈互助化归于社会行动,需要考虑行动主体,更需投射至主客体的互动与场景结构的耦合。韦伯赋予社会行动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二是社会行动指向他人^[25]。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延续了社会行动存在一定结构和发挥相应功能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深化了社会行动理论,认为有意识的社会行动是包含行动者、目标、条件、手段、规范(包含思想观念、文化、价值取向等)的单元行动^[26],将其视作在一定情境下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系统,行动者在适应情境时是根据行动者相互之间所共享的角色期待模式而采取相应的行动^[27]。

基于帕森斯模型并稍作调整,本研究考虑理论意象和现实情况构建了涵盖上述要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图 1)。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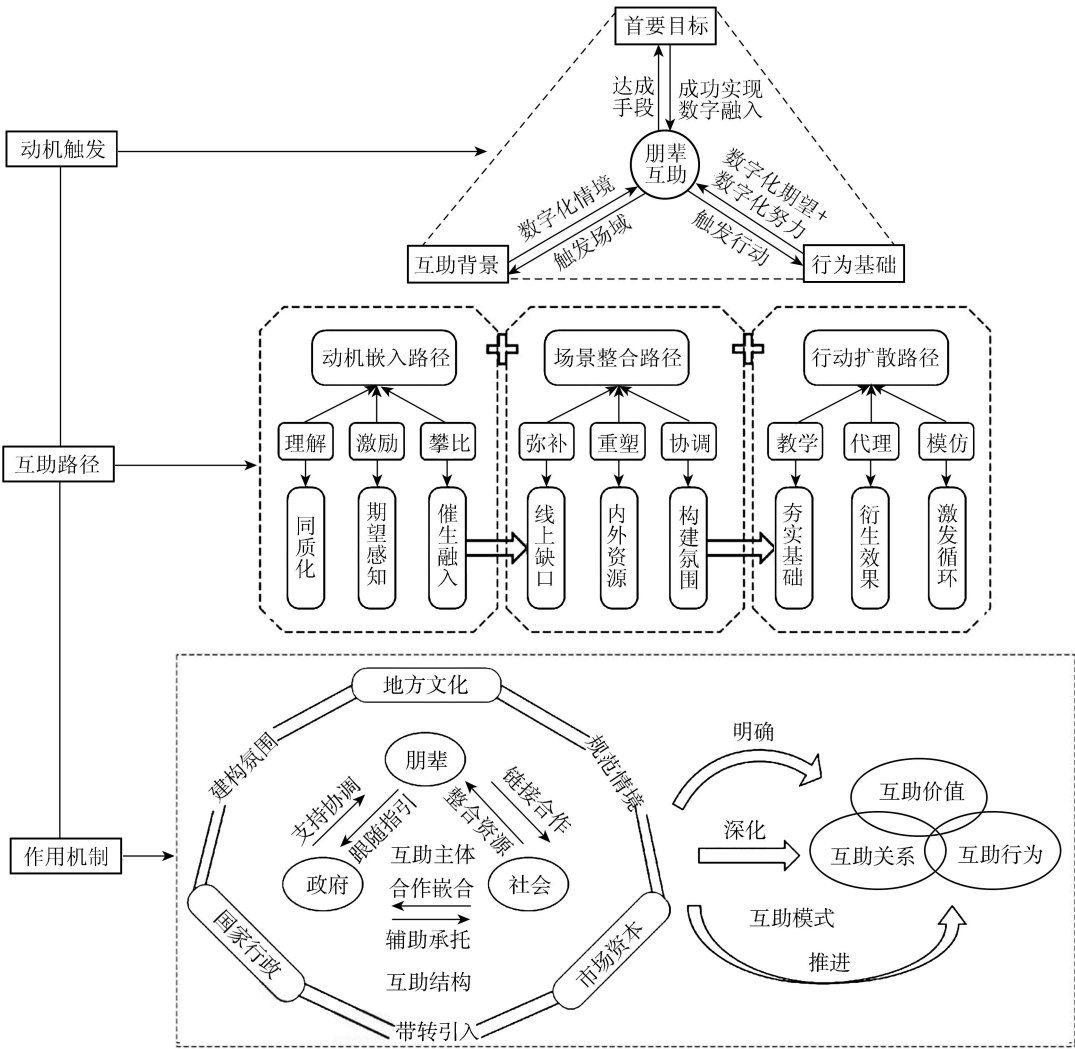


图 1 朋辈互助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分析框架

动性和主观意志的老年行动者与源于背景 and 个人的首要目标适配为“动机触发”;为实现目标,行动主体会选择相应策略,不断调整情感态度、所处场景和行动方式凝聚成手段,框架中衍化为“互助路径”;并适恰和补充前者,系统性整合具有融入共识和合作行动的多元互动关系凝聚而成的纳入互构支持行动的融入持续循环机制。

(1)数字社会融入的动机触发:互助背景与行为基础

老年群体朋辈互助势必要在一定场域背景内活动并受其影响,通常场域强调的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形构,本研究将数字融入的互助场域简化为数字化情景。数字化情境是指外界对社会个体数字化行为的各种限制:一是数字接入设备,互助条件即持有具有上网功能的智能设备可供老年群体接入。二是数字社会文化,常见形式有与数字化行为有关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传统认知^[28]。老年群体常被视为脱离数字时代的非主流人群,老年朋辈互助从而摒弃刻板印象是重塑社会规范的重点。三是数字融入氛围,更多描述该地区经济是否发达、促进科技发展的数字氛围是否良好等。当一个地区充分普及电子支付、电子车票等生活化的科技产品,老年群体也会自愿或被迫推动融入数字社会,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使用电子产品。

数字时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身心步入衰老的老年群体难以及时适应,需要时间以及他人的辅助才能得以顺利融入,但多数情况下因为技术使用和生理障碍,老年群体被迫游离于科技,自觉压力和自卑,产生数字排斥,从而表现为回避、替代、忽略和抵制的数字融入障碍行为^[29],在心理上更是递进到严重的厌恶情绪。因此,老年群体克服心理障碍并拥有强烈的数字融入期望是数字融入的先决条件。同时,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行动基础在于其怀着数字化期望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数字化努力,数字化努力是社会个体在进行并完成数字化行为中付出的时间,以此积累数字化设备与服务的使用经验^[30]。“熟能生巧”一词诠释了数字化努力,当老年群体付出了相对较多的时间使用智能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直接操作成功或因操作失败

不断重复而积累出数字化经验形成老年人自身数字社会融入的普遍路径,数字融入成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

(2)数字社会融入的互助路径:“动机嵌入-场景整合-行动扩散”三重互构

基于现实样态的呈现和关键驱动要素的整合,厘清朋辈互助促进数字社会融入的形成路径有利于构造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可持续循环机制。朋辈效应的有效发挥依靠来自情感态度、场景创设和行动表征三重逻辑互构而成的网络共振,构成“动机嵌入-场景整合-行动扩散”的互构路径:在情感态度方面,朋辈间因同质化而产生的理解心理、激励态度和彼此间相互竞争的良性攀比都能有效克服老年个体单维融入数字社会时的心理问题,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与向外驱力,进一步增强积极参与数字社会的意愿,有效嵌入融入动机;在场景创设方面,组织情境下的融合弥补重塑了朋辈群体间的结构力与行动力,实现了资源互通统合增效;在行动表征方面,朋辈间的互助凝聚成信息扩散源,教学、代理和模仿行动使得数字融入呈现高水平输出与输入状态,从而提升融入效果。

(3)数字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三维一体

数字融入的目标愿景是构筑以朋辈为核心的数字融入持续循环机制,在数字融入的过程当中,达成互构网络的自我调节与灵活运转。作为“数字贫困者”,在基础场域的客观作用下,老年群体会逐渐产生数字化期望,并在个体数字化努力下,付出时间、积累经验。随着组织和人际的融入,老年群体得到了数字化设备,拥有了数字融入的中介,并在数字化环境的渲染下,通过良性的朋辈互助循环习得数字技能和习惯,能够获取相当的数字凝聚力并将之传递出去,从而逐渐蜕变成互助闭环。老年群体数字融入过程,实际上蕴含着“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凝结的运作机制,有效并成功的数字融入是凝聚了个体期望与努力、组织帮助与社会支持多方交融的共同体。在这当中,朋辈互助作为主轴发挥作用,带动老年群体不断完善驱动因素从而实现数字融入蜕变。

二、朋辈互助何以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案例样态

1. 研究设计

为有效跟踪老年群体数字融入,本研究成立“数字追赶行动”项目组,根据政策方针和成员生活经历,分批次选择具有数字融入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区,因地制宜选择不同方法追踪各地域的老年群体弥合数字鸿沟且步步发展并成功实现数字追赶的过程,最终达成数字融入的参与感与满足感。案例基于在SZ市开展的“数字追赶行动”项目,采用个人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通过老年群体自身口述史的方式进行案例整理,对象的选取规则按照社群属性强且方便“滚雪球”的原则,所选定的老年人大多居住在同一片区,并且因相同的兴趣爱好集合形成“广场舞”群体。对比之下,受访者初始多为群体中的“数字贫困者”,历经了从数字素养较低到较高阶段的演变历程。此次深度访谈对象囊括50名老年人,访谈时间为2022年12月—2023年4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次数不等,基本为3~5次,每次在30~60 min(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受访者编号	年龄	性别	社会身份	居住安排
A1	66	女	随迁老人	与子女同住
B2	67	男	本地居民	与子女同住*
C3	72	女	初创者	与子女同住
D4	74	女	本地居民	与配偶同住
E5	66	女	随迁老人	与子女同住
F6	73	男	本地居民	独居
G7	68	女	初创者	与配偶、子女
H8	66	女	初创者	独居
I9	70	男	本地居民	独居
J10	64	女	随迁老人	与子女同住
⋮	⋮	⋮	⋮	⋮
F46	65	女	初创者	独居*
G47	70	女	本地居民	与配偶、子女同住
H48	64	女	初创者	与子女同住
I49	67	女	本地居民	独居
J50	63	女	初创者	与配偶同住

注：* 为舞队微信群群主。

受访的老年群体中,有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前往SZ市“淘金”的初创者,有的是因子女工作随迁而来的“异乡候鸟”,还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其中女性比例达86%,平均年龄为67岁,且大多与子女、配偶同住,少数独居者。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同,数

字融入角色也不同,但其社会身份与数字融入中的社会角色并不具有完全对应的关系,即无法断定“异乡候鸟”必定是“数字贫困者”,或者社会资产丰厚的淘金“初创者”必然数字融入良好,这恰好佐证数字融入中的角色身份是互构、动态的。

2. 参与式案例观测

SZ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目前已进入全球创新城市网络第一阵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建设的核心都市,SZ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数字发展环境与资源,在这种优越的数字条件下,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的可行性大大增强。即便作为人口超千万、属于“最年轻”的超大型城市,SZ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94万余人,占总人口的5.36%,20年的占比增幅达72.9%,老龄问题不可小觑。作为先行示范区,无论是在政策布局、社会精细化治理支撑、养老经济抑或是技术层面,SZ市在老龄化领域都做出相应探索并培养发展了一定的基础优势,这种“强结构”的典型性和辐射性对于减少其他条件干扰而着力研究老年朋辈效应的发挥具有更鲜明的代表意义。随着SZ市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依托数字先锋城市的光环,部分老年群体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弄潮儿”,无论是数字技能的习得还是数字素养的培养,其都向数字融入的方向发展并逐渐练就而成。“数字贫困者”处于数字融入的底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当前学界的数字化社会分层模型研究中多将数字贫困分为物质贫困、意识贫困和素养贫困,将其定义为“没有物质条件、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使用电脑或上网的人”^[8]。访谈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有的老年群体作为“数字贫困者”的肖像特征,在城市市场域存在的数字融入困境,这些特征与困境反而促进了他们数字角色的嬗变,见证了这些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的进步与发展,成为数字时代的中坚力量之一。案例当中的“数字贫困者”存在几个显著障碍特征,具有数字融入可行能力的提升空间。

第一,数字素养较低。虽然这类“数字贫困者”基本摒弃了物质贫困,但是仍处于素养贫困状态。数字素养通常被界定为获取、理解、整理和批判数字信息的综合能力^[31],与青年群

体不同,这类老年群体至多使用基本的手机功能进行联系沟通,但无法进一步制作和丰富数字化内容,也无法根据专业知识进行数字化传播等活动。案例中的“数字贫困者”在设备操作和交流协作上有所涉及,但数字素养仍未达标,他们无法迅速识别并区分付款码和“扫一扫”功能,无法辨别骚扰短信的真伪,也不知在聊天框里如何发送视频、红包,这些老年人难以迅速准确地完成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数字行为。

第二,数字意识的相对贫困。这些“数字贫困者”只具有数字融入的被动意识,主要是获取和依靠他人创造的信息内容,而不是主动创造并传播。如,购物时的电子支付需要基本的信息技术接入和信息获取,但这都是基于城市高度数字化的迫力之下作用而成,作为“数字贫困者”的老年群体在主动意识上有所欠缺。再如,拥有极强社交性的“广场舞”微信群中,只有寥寥几人乐于拍摄视频并上传到群,甚至发送到个人视频号里供人转发收藏,通常来说大部分成员只会点赞,一方面,他们无法摸清这些烦琐的上传和发布流程;另一方面,他们虽然乐于将自身的风采展示给他人,但并没有主动进行数字传播的意识。

第三,缺乏数字交往的可行能力。作为超大城市中的“数字贫困者”,尽管具有强烈的社交连接需求,但大部分老年群体的社交局限于家人和亲戚、邻居和老朋友,鲜有途径结交新的朋辈。即便在现实生活中结交新朋,也并不会像年轻人一样首选交换网络联系方式,一是由于数字意识匮乏,二是并未完全熟练操作添加新的好友。在一个具有强烈社交联络属性的社群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充分的数字凝聚力,因而也就缺乏数字交往的先驱条件。

第四,难以及时获得年轻人的技术支持。一方面,老年人与年轻人生活节奏不同,忙碌的年轻人无法付出更多时间和耐心及时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数字学习风格和速度与老年人截然相反,面对老年人的数字障碍不甚理解也无法感同身受从而因材施教。

三、朋辈互助何以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互助路径

案例通过对多位老人的追踪发现:朋辈互

助的数字融入群体中,老年群体基本可以分为两类:“数字角色接受者”和“数字角色赋予者”,他们之间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比为“鱼”和“渔”的关系,赋予者的数字凝聚力来自“授之以渔”。实践表明,当原始的“数字贫困者”得到互构支持网络支撑,感知自身数字能力和素养显著提高,当周围亲朋遇到数字障碍时,这类群体就会提供帮助,并实现从“数字角色接受者”到“数字角色赋予者”的转变,将期望和技能赋予他者,并通过凝聚式的人际交往将数字技能传递,有意识地提高数字素养。因此,发挥朋辈效应是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脱贫并完成融入的关键驱动因素,而如何以此为核心,集合自身及外界等其他因素实现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路径循环,是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应有之义。

1. “理解+激励+攀比”的动机嵌入路径

以“共鸣式响应”为核心的情感态度逻辑,成为数字融入的动机来源。实践探索中,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动机可从“理解+激励+攀比”3个维度解读:通过朋辈之间需求动机和学习态度的情感共鸣,对数字融入主体行动过程中彼此的行为做出态度响应,反馈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的需求特征。

(1) 同质化推进理解与包容

囿于相似的数字障碍与数字陷阱,朋辈对彼此面对数字社会的心境和操作通常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与包容。一方面,已成功进行角色转换的老年群体大多受家庭影响,他们通常与家人同住,遇到操作难题及时寻求家人帮助,且家庭成员倾向于鼓励其尝试更多更新的功能,老年人自身期待着能够学会更多数字技能并因此做出一定的成就反馈家人。作为数字红利享受者的家人往往会出现不耐烦、不理解的负面情绪,这时,朋辈之间的互相“取经”反而更能理解问题所在。“我儿子叫我可以去下载一个腾讯课堂,这样儿子儿媳上班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忙监督我孙子上课。有时候卡壳了,拿手机问一下跳舞的姐妹,她孙子跟我孙子一个班的,我一问她又快又有效,面对面教我怎么点,比我儿子教还快嘞!”(受访者A1)另一方面,出于共同兴趣而自发集聚的群体更能明确个体的兴趣志愿,从而利用合适的数字工具彼此促进。

(2) 激励赋予期望感知

案例中,社群组织朋辈间的互助激励、积极学习数字技能的氛围起到了强大的助力作用。以社群形式聚集的时候,“数字贫困者”积极参与数字化社交和娱乐,朋辈对老年“数字贫困者”的态度转变,从其他数字得利者常见的“不耐烦”“疏远和隔离”化为积极支持和鼓励,从外界施加对老年群体角色转换的期望,鼓励他们适应新角色。当老年人感知到自身和外部的期望格外强烈时,他们能极大增强数字融入的自信心,从而提高融入的成功率。老年群体数字学习倾向于需求驱动,出于理解包容的情感共鸣,朋辈会积极主动地激励他人,乐于提供实质指导和言语鼓励,即使因为性格差异、面子问题等各方原因而未实施主动求助和援助的朋辈间,当有需求时往往也会被动回应需求“……她在教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就可以做视频,你看,点几张图片再点一下底下这个制作视频。我以前不知道怎么发,挺不好意思的。我现在经常拍出来发到广场舞群里,他们都夸我学得快……他们一鼓励我就来劲,就越想做好。”(受访者 D4)

(3) 攀比催生融入动机

作为角色赋予者的朋辈给予“数字贫困者”的不仅仅是期望,还蕴含推动的压力。社会刻板印象中的老年群体往往是学习能力差、效率低、速度慢,这种压力推动着老年群体的好胜心驱使行动。除此之外,老年群体在人际交往、组织社群中都会进行“攀比”,会注意到其他人的起点水平、学习速度和学习能力,并在无形中产生促进压力,催生群体中隐形的良性竞争攀比。这种基于朋辈社群间共鸣的心理会刺激老年群体做出响应,发挥最大限度的数字化努力。“我们一起跳舞的几个大姐经常在淘宝上给舞队买道具,我就在想她们怎么这么厉害啊,我也想学,现在也会在淘宝、拼多多上买舞蹈道具!”(受访者 F6)

2. “弥补+重塑+协调”的场景整合路径

以“创设式满足”为核心的组织情境逻辑,成为数字融入的嵌合重点。实践探索中,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情境场域可从“弥补+重塑+协调”3个维度解读:通过整合数字化情景

和提供社会支持,满足数字融入主体行动过程中所需的外在条件,引导、助推和协调老年群体嵌合运作机理,组织相比个体拥有更广泛的资源,能聚合社会资源实现数字融入目标。

(1) 熟悉场域弥补线上不便

相比线上交流,老年群体更愿意在现实熟悉的情境下进行朋辈互动,“公园长椅、餐厅饭桌、练舞广场”等创设的“面对面”生活化场景弥补了线上具体演示的不便,同时支撑着克服不同个体间因设备、技能和素养的差距造成的沟通障碍。“微信说话看不到的嘛,像发朋友圈我都是跳舞休息的时候让大姐教我,直接对着我的手机教就好了。”(受访者 B22)

(2) 内部和外部资源的重塑

朋辈与老年群体个体的双向作用实际上打破了内外部资源的分离,化解了个体独立带来的碎片化矛盾,重塑了彼此融入能力。案例发现,通过建立网络聊天群组,统合数字能力水平不一、数字素养不等的老年个体,形成的线上线下密切的互助团体,为互助责任划分、资源重组、利益分配提供了基础条件:一方面,在数字技能掌握良好的老年人个体的影响下,组织中的“数字贫困者”逐渐掌握拍摄视频、上传视频的功能,甚至会不断精进数字技能,例如剪辑、加字幕特效等。在社群里获得赞扬和鼓励的良性评价后,他们开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涉猎更多新兴设备、功能和软件,甚至在社交软件平台上也追求传播广度和获赞评数,角色蝶变地在组织内部成为赋予者。另一方面,互助团体吸纳重塑了外部资源,解决了个体间对新事物的信任冲突、意愿矛盾和渠道闭塞问题,在团体内激发个体间资源分享和合作互助意愿,构筑了联系团体内部和外部数字社会的组织基础。“有时候我还会叫我外孙女帮忙教一下不会的姐妹呢!”(受访者 G47)

(3) 多元协调构建老龄友好氛围

他者帮助的协调是关键,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政策扶老-社会助老-科技适老”三位一体的多元协同赋能模式。政府联合市场、社会力量等多个主体,促进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政府营造了浓厚的数字环境,并提供了标准化的数字服务,发挥公共服务供给功能;社区及党群

服务中心承担科普、引导、培训等功能,近距离地赋予老年群体数字技能习得的条件,并通过防诈骗科普、法律法规教育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以社区为扶老主体,社区的便民性保证了政策落实的速度与细致,同时还鼓励更多活力老年人在习得技能后争当志愿者,走进社区传帮带,从他者赋能转变到成为他者。社会组织承担部分责任,整合社会分散资源,推广并鼓励多元主体主动参与老龄数字融入行动,打造出了具有城市特色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对面穿红马甲那个小伙子,小张,是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来跟我们宣传说阿姨们要防范骗子,后来熟了有时候我们拍视频还让他帮忙!”(受访者 I39)

3.“教学+代理+模仿”的行动扩散路径

以“凝聚式交往”为核心的行动表征逻辑已成为数字融入的交互联结,案例研究发现,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行动特征可从“教学+代理+模仿”3个维度解读:作为社会支持的一部分,朋辈互助为老年群体提供了融入方向,在以朋辈群体为核心的人际交往中,联结生成数字融入的互动凝聚力量,其得益于两项基础行动:教学与代理,而模仿是行动扩散的关键因素。同龄人数字交往中的教学和帮助、模仿和学习,是数字融入的典型路径之一。

(1)教学夯实扩散基础

具有安全感的人际圈能形成“老带新”“熟帮疏”的数字学习氛围,数字能力较好的老年人自发地带领和指导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数字贫困者”通常怯于主动使用智能设备,也怯于表现自己的数字技能,他们或许怀有一定的数字融入愿望,但无法积极主动并及时提升自己的数字技能和素养。对于“数字贫困者”的老年群体而言,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教学使得主动意识得到显著提升。受益于广场舞社群影响,数字能力不足的老年群体会为了加入群体而主动学习新技能,当较高水平的老人成为“老师”、同水平的老人成为“同学”后,其能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养成主动回应、主动发起的意识与习惯。其次,教学促进数字技能熟练应用。在信息处理、问题解决方面,随着数字技能的提升,数字能力

不足的老年群体能够慢慢发现软件的推荐算法并进行合理利用。如,部分老人可能已经注意到抖音等短视频软件会根据搜索历史、关注人推荐感兴趣的内容,因此会格外关注健康、团体舞等内容,期待大数据算法自动处理并呈现。同时,这类老年群体也可从以往被动地接收信息,“已读不回”“已读无法回”的情况升级迭代成为能够自己处理信息、创作信息、发送信息。最后,教学促进安全意识不断觉醒。“数字贫困者”在网络安全上通常表现出两种极端:一种是有着强烈的警戒意识,因为不熟悉,担忧被骗而不敢操作,因噎废食;一种是毫无警戒意识,轻信网络所有信息。随着外界信息输入和朋辈提醒,老年人在这两者中寻求平衡,既能够熟练操作购物软件的付款等安全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界面,也能合理辨析信息的真伪,不轻信网络谣言,也学会合理分辨网络商品的可靠度。“我儿子之前还说我会被骗,搞得我都不敢去买东西。其实我现在都很清醒,打电话让我交钱的我一律不理的,我都不乱买的,好多人说老年人好骗,哪里这么好骗,我们又不傻,只是老了!”(受访者 C3)

(2)朋辈互助涟漪效应

因共同的兴趣爱好所组成的社群,形成一种近乎传统的“凝聚力”,“数字角色赋予者”吸纳社群中的需求与矛盾,在接受者无法顺利自主完成数字操作时,这部分群体往往会通过交流和直接操作实现朋辈互助,这作为朋辈互助的衍生效果是凝聚式反哺的涟漪效应,在物质补充和精神影响上起到助推作用。“……你看我一开始只会把微信支付这个码亮出来给别人扫的,要是别人贴个码在那里给我扫,我都要找好久哪里按出来扫,好怕耽误别人时间的。后来好姐妹拿我手机帮我点还教我怎么按出来,我学会了也可以帮助有同样困惑的姐妹了。”(受访者 H8)除此之外,“代理”还喻示着部分老年人数字技能提升的显著成果,老年朋辈互助相比较于数字反哺代际支持存在着更为突出的优势特征,通过访谈了解到,绝大多数老年人基于数字反哺的帮扶行为的参与过程不显著,而朋辈的数字代理行为发生时,老年人自身的数字学习动机被捕获的情况则较为显著,并萌

生从数字贫困者转化为数字技能惯习者的念头,即同辈既然可以实现有效的数字融入,其自身也理应能够达成相应的数字社会行为路径。因此,朋辈数字互助也从实践与精神等多个层面形成了涟漪效应。

(3) 模仿激发扩散循环

数字吸引力是构筑融入路径良性循环的隐性条件,数字吸引力可以理解作为一种个人魅力,是通过展示自己在数字领域的实力和经验,吸引并影响其他人的意见和行为。在数字领域,成功的人拥有着强大的数字吸引力,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使用的工具、应用程序及数字行为,都会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和模仿。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数字吸引力时,他们可以成为社群中APP使用的风向标,抑或带领众人尝试更多的数字用法,从而达到行动扩散效果。通过社会交往互动,模仿性传播得以进行,而这种模仿行为也是新技术传播扩散的重要机制^[32]。案例中,这部分老年人基本上是联系群的群主或是拍摄视频、上传视频最活跃的老年人,他们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在争取成为社群里数字“话语权”最高者的过程中,其利用并创造的信息得以被赞扬、被传播、被模仿。其他同辈也会在这样的氛围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前者学习并效仿掌握相似的数字技能,从而累积数字素养,提升主动融入意识。“陈姐(广场舞微信群群主)很厉害的,我们舞队比舞的视频都是她拍的,发到抖音上还会搞特效,我都是向她学的!”(受访者 G7)

四、朋辈互助何以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作用机制

前述的案例观测和互助路径可以说是一种结果性描述,本研究从“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三维出发,对案例背后的具体实现机制剖析,力图归纳朋辈互助促进数字融入的内在机制。

1. “朋辈-政府-社会”多元共振的互助主体

朋辈社群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共建、互助共赢,是朋辈互助推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内生机制和核心引擎。老年朋辈、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嵌套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复杂

网络,凝聚为多重力量。朋辈效应的发挥旨归于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因此,老年朋辈既是发展的客体,也是融入的主体。老年人个体是最基础的融入动力来源,但独立个体的障碍与无力显著,需要通过组织化、社群化的集聚整合力量,朋辈由此将起到互构网络中的枢纽作用,是持续驱动融入的强大引擎。政府可通过行政命令和领导营造适老化氛围,这是推动齿轮运转的重要力量。在以朋辈为核心的互构网络中,政府更多的是构筑顶层设计,承托底层逻辑,横向链接群体和社会,起到协调、支持和辅助的作用,而其他社会力量同样需要根植于互构网络,如慈善组织、科技公司、社区志愿者乃至家庭无形中促成伙伴关系,能整合协调多重资源,培育提振老年群体融入条件与信心,密切合作嵌合提高融入水平,链接外部资源供给丰厚的融入发展空间。

2. “行政-资本-文化”合作逻辑的互助结构

数字化背景下,互助主体实际上牵涉国家制度、市场环境与地方文化等多重要素,成为影响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重要互助结构,正是在此结构下,互助主体才能得以顺利行动。国家行政逻辑下的制度环境与方针政策奠定了融入基调并指引方向,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而早在2020年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就提出要指引挖掘老年群体与社会力量提升数字技能和素养,建构数字社会融入的社会氛围,提供合法性基础与积极的政策环境。国家政策的重视带动着资本市场对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风口的引入,市场逻辑下的参与建设更为直接有效,这主要体现为科技公司、运营商等对适老化工具的更新与数字培训上。在国家行政的宏观指引下,资本市场归于利益和声望等因素,以适老化设计、培训策划和数字化推广等多重方式规范市场环境并深入数字社会融入进程。地方数字文化氛围始终是具体落实融入的客观情境,当地老年群体融入需要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包容、开放、积极的文化氛围会推进数字设施的铺开。同时,老年群体与当地文化场域会产生人情链接,这会进一步影响行动主体对数字融入的看法和方式及互助网络间的关系。

3. “价值-关系-行为”三维一体的互助模式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涉及多元行动主体,稳定的互助模式和协调的互助网络才能有效提升可持续循环的融入路径。在前者基础上,要明确互助团结的共生价值理念,衔接结构因素深化互助关系,推进互助行为的扩散与落实。融入共识与互助认同连接为互助团结的共生价值理念,不同个体的社会身份与利益诉求不同,但都因共同兴趣与数字融入共识形成互助团体,这种集体意识赋予了互助主体的行动意义,从而彼此凝结力量内外联动明确行动策略达成一致。这种价值理念随着明晰程度加深固化了互助关系的韧性,互助主体的深度联结和互助结构的弥合持续深化互助关系,互助主体间的能力与资源差异显著,互补关系有效填补差异,合作模式下的共赢推进长期稳定关系的形成。互助主体需要协作互助,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也在赋能其他主体,提高了各行动主体的能动性,自我与他者赋能取得的获得感持续深化互助关系。有效的互助行为是激励互助主体运转、维持互助关系的核心,随着各方力量的集结,互助行为动态调整应变,嵌套于朋辈紧密互动的融入行为也不断加深协调。

五、结 语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关注老年群体受朋辈效应驱动,在数字融入进程中完成数字角色的重构与迭代,个体在环境、工具和人际的多重作用下完成数字融入的蜕变,以SZ市50位老年人为例,提炼朋辈效应发挥的驱动路径并剖析其促进数字融入的内在机理,试图构筑融入的可持续循环机制。结论如下:第一,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动机触发基于互助场域的可行性和行为基础的能动性,数字化情境有效赋予了其数字融入的外生动能,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的社会规范和良好的数字环境则奠定了其融入互助的基调与合理性,搭建互助的初始背景。老年群体强烈的数字化期望与相应的数字化努力有效培育个体融入力量,导入内生动力并扎根融入背景,从而实现数字融入的目标旨归。第二,通过超大型城市老年群体的观察实例可知,朋辈效应的发挥

倚仗“动机嵌入”“场景整合”和“行动扩散”三重路径得以整合碎片化需求;以“理解”“激励”和“攀比”为主的情感共鸣和态度响应明确了行动主体的融入动机;以“弥补”“重塑”和“协调”为主的情景支撑和资源整合厘清了行动主体的融入结构;以“教学”“代理”和“模仿”为主的行动基础和互动源力刺激了行动主体的融入循环。第三,朋辈互助促进数字融入的运作机理基于“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三维逻辑:形塑了多元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个体化与组织化的双向嵌入调整了数字融入不同力量的关系支撑;多尺度联结合作厘清各主体的行动逻辑,行政、资本和文化交织安排不同行动方案,从而构筑起坚实的互助结构;利益的冲突与协商形成稳定的、契合的可持续性互助模式,行动主体认同价值理念的建立深化了互助关系,互助行为也随之动态调整。

2. 对策建议

研究表明米德的“三喻文化”中用以形容同辈之间互相学习的并喻文化显然适用于老年群体并立足于数字社会,在普遍关注老年“数字贫困者”如何通过家庭反哺或自我成长实现数字脱贫的环境下,本研究抽离出部分视角聚焦朋辈效应何以发挥作用。区别于常见的乡村数字贫困即双重弱势研究,本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边界,系统阐述了在数字条件较为充分的城市中,数字弱势群体要如何集结可得资源、联结朋辈关系实现数字融入,从“强结构+弱主体”的视角理解融入模式,弥补关注视角单一的缺陷,既能为老年群体朋辈影响增添研究思路并提供融入经验借鉴,也能为数字基础和条件较好的地域提供帮扶模式对策建议。

于老年个体与数字基础和条件较好的地域而言,如何进一步增益朋辈效应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朋辈互助的帮扶模式如何循环?可由微观到宏观,从老年群体、社区、资本市场到政府层面组合联动,提供现实层面上的对策建议:其一,建立老年朋辈互助小组。以常见的社会交往组成相应的朋辈社群,在社交活动中建立同伴社区,譬如“广场舞群体”“老年大学班级”甚至“麻将兴趣小组”等,通过与内部志同道合的成员互动,在本身就因兴趣而自发组合

的社群中组织建立老年朋辈互助学习小组,分享数字技能的使用经验,调适相应的融入情感态度、整合其中的结构情境资源并付诸学习动作,融入效果或许更为显著。

其二,构建多元化的朋辈互助平台,创新朋辈互助模式。结合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构建线上朋辈互助平台,如微信群、社交媒体群组、在线论坛等,这些平台不仅能够定期发布数字技能学习资料、教程和视频,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数字技能培训体验,还能让老年人在线上也能进行交流和互助。老年人家庭反哺难以起正向效果、因政策惠利和技术进步使之自身适应较缓之时,外求资源赋能且“润物细无声”应是较好的融入形式。

其三,社区和相关组织提供适宜的社交场所和环境,以便营造良好的数字文化氛围。社区和党群服务中心利用既有场地和人员资源提供便民数字教育,以集中课堂、宣传活动或公益援助等形式为老年群体服务,同时也为朋辈社群日常互动供给更为稳定、设施条件更好的活动根据地。尤其是针对具有组织化整合机制的后单位制社区,利用内部的积极分子和关键群体吸纳进互助体系,建立适应性供给机制^[33]。老年大学、文化宫等成熟的社会组织则可以多元工具维度推动朋辈数字融入,利用组织师资和教学设备使得不局限于智能手机的操作应用,涉猎电脑、平板甚至摄像机等多样工具,通过学习新工具、开发培育的兴趣加深老年群体朋辈间的交流沟通及与后辈间的学习。

其四,市场不断拓展数字设备与应用适老化改造,以便营造友好真实的数字使用氛围。智能设备制造商应切身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升相应服务,考虑到他们在生理上的显著弱势,设备上设置字体大小、屏幕光感亮度、播放音量等的操作路径都应简尽简,程序应用上进行适老和无障碍改造,系统的前终端设计上加入语音播放的“听读”模式、指引求助功能、人脸识别隐私保护等特殊配置,以供老年群体畅享数智。同时,考虑协作模式嵌入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领域,以企业赞助、政企联合、企业承办活动等方式搭建资本市场与社会链接桥梁,开展一系列数字帮扶,老年群体朋辈的集结性和

凝聚性使得囊括范围和帮扶效果大为增效。

其五,政府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范围。鉴于以“情感劳动”为主的线上生产方式逐渐兴起,以直播形式应运而生的兼顾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银发意见领袖和银发“网红”在老年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34],朋辈间分享更易广泛传播,已接入数字媒介基础设施并较高频率使用数字媒介、热衷于信息交换的朋辈群体间甚至会出现“银发冲浪族”^[35],尤其在案例中典型的广场舞群体更为推崇,但当中夹杂的价值观错位、虚构引导、不规范营销等风险,网络辨别能力较弱的部分老年人或许会被迷惑并通过朋辈效应放大不良影响从而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失,因此需相关政府部门密切关注网络趋势,采取相应网络整治措施,根源上杜绝风险现象的频发。

尽管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系列探讨论证了朋辈互助确有助于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但数字融入的异质性和具体实践的复杂性昭显案例研究无法一举概括所有地域的数字融入探索,案例的选取基于代表性城市中的社群组织,具有成功的偶然性和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进一步剖析不同城市集群规模或乡村场域数字弱势群体的成功转型案例,例如数字条件更为严峻的我国西部山区和少数民族等农村地区数字媒介和应用下沉的蕴含机理和运行模式,亦可以将视角切换到新加坡、荷兰等其他文化和制度不同的代表性城市的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实践历程,进一步探究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普遍规律和内在机制。同时,本研究选取的案例群体女性色彩浓厚,或许未来可以关注性别差异对朋辈互助驱动数字融入的潜在影响。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中国文化的重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6.

[2] JAN A V D. The deepening divide: 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5.

[3] 于良芝. “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 (1): 4-12.

[4] PRENSKY M.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 1[J]. On the Horizon,2001,9(5):2-6.
- [5] FRYER W. Digital refugees and bridges[DB/OL]. (2006-06-10). <http://blog.infinithinking.org/2006/10/digital-refugees-and-bridges.html>.
- [6] 颜昌武,叶倩恩. 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一个批判性审视[J]. 学术研究,2022(2):51-58.
- [7] 周裕琼. 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7):66-86.
- [8] 闫慧. 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应用[J]. 图书情报工作,2012,56(6):90-94.
- [9] 阿尔文·托夫勒. 权力的转移[M]. 吴迎春,傅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260.
- [10] 闫慧,张鑫灿,殷宪斌. 数字包容研究进展:内涵、影响因素与公共政策[J]. 图书与情报,2018(3):80-89.
- [11] 陆杰华,韦晓丹. 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J]. 人口研究,2021,45(3):17-30.
- [12] 石晋阳. 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困境与媒介教育出路——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J]. 青年记者,2020(25):14-15.
- [13] 杨一帆,潘君豪. 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及应对路径[J]. 新闻与写作,2021(3):22-29.
- [14] 匡亚林,于静波. 西部农村老年群体数字排斥的生发逻辑与消解对策[J]. 人文杂志,2024(4):109-118.
- [15] 匡亚林,蒋子恒,张帆. 从“阻老”到“助老”: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3):70-84.
- [16] 贺建平,黄肖肖. 城市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实现幸福感:基于代际支持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J]. 国际新闻界,2020,42(3):49-73.
- [17] 李嘉兴,王晰巍,李师萌,等. 信息生态视角下老年用户群体微信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7,61(15):25-33.
- [18] 匡亚林,余文丰. 西部城市老年数字贫困群体的数字融入障碍及其矫治研究[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36(2):103-114.
- [19] 周裕琼,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20,42(3):6-31.
- [20] 于潇,刘澍. 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1(6):67-82.
- [21] 蒋俏蕾,刘入豪,邱乾. 技术赋权下老年人媒介生活的新特征——以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为例[J]. 新闻与写作,2021(3):5-13.
- [22] 周思慧,林施言,李岚,等. 朋辈互助视角下老年人数字融入特征与策略——以智能手机使用为例[J]. 科技传播,2022,14(9):109-111.
- [23] 林宝.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的难点与重点[J]. 人民论坛,2020(29):129-131.
- [24] MARTIN C L.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 high-involvement product attribute approach[J].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1998,7(1):6-26.
- [25] 张广利,王登峰. 社会行动:韦伯和吉登斯行动理论之比较[J]. 学术交流,2010(7):135-139.
- [26]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33.
- [27] 吴立保,王达,孙薇. 大学共同治理的行动结构与路径选择——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J]. 教育发展研究,2017,37(5):39-45.
- [28] 王明,闫慧. 农村居民跨越偶现式数字鸿沟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价值——天津静海田野调查报告[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9(5):39-49.
- [29] 匡亚林.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影响要素、用户画像及政策回应[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1):46-53.
- [30] 闫慧,闫希敏. 农民数字化贫困自我归因分析及启示——来自皖甘津的田野调查[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5):68-81.
- [31] 苏岚岚,彭艳玲.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J]. 农业技术经济,2022(1):34-50.
- [32] 刘入豪,邱乾. 老年人数字鸿沟中被忽视的朋辈影响[J]. 青年记者,2020(36):31-32.
- [33] 龙斧,李玉霞. 差异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适应性供给[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97-106.
- [34] 赵红艳,王丹蕾. 代际差异与数字融入:智媒时代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质性研究[J]. 未来传播,2023,30(5):33-41.
- [35] 孙天梦,郑欣. 刚需性融入:银发冲浪族的数字社会化及其隐性不平等[J]. 编辑之友,2024(4):56-64.

(编辑:高虹)

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Peer Support to Promote the Digital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A Participatory Case Study Based on A Megacity/KUANG Yalin, WU Jiaxin(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Aging and digitalization have become the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today, and how to adapt and integrate the elderly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active aging. Reality shows that when the long-term and complex natur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quires sufficient conditional efficiency,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families lags behind or even disappears, the play of peer effect becomes a digital suppor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and its own initiative, univers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digital integration. Using case analysis metho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lderly group who are driven by peer effect and complet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teration of digital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tegration. They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environment, tool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fully tap the potential of peer effect to promote digital inclus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of “motivation triggering-mutual aid path-action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he elderly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a triple mutual construction path of “motivation embedding-scene integration-action diffusion” is defin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case observation. Furthermore, it further reveal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 peer mutual assistance is the core, and it is formed by multiple interactive relations with consensus and cooperative actions, and the continuous cycle mechanism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subject-mutual assistance structure-mutual assistance model” is supported by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revealing the behavior logic of dig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digital poor”.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dynamic evolution, and then provide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t different levels from the realistic dimens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digital society; active aging; the elderly; digital integration; peer support; digital poverty